

A New Approach to Confucian Culture

陈德述 著

儒學

文化新论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儒学文化新论

陈德述 著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文化新论/ 陈德述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5. 9
ISBN 7-80659-769-7

I. 儒... II. 陈... III. 儒家—传统文化—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083 号

儒学文化新论

陈德述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封面设计	唐利群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028)87427333
版 本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0mm×202mm
印 张	21.875
字 数	50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769-7/B·136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姜 生

《儒学文化新论》乃著名儒学专家陈德述教授多年潜心研究成果之精华，其中许多篇章对于现代儒学研究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读罢受益匪浅。其突出特点在于，不只局限于研究儒学有何物，而重点探索其一般价值与普遍意义，以提升中华文化之生命力、亲和力，使民族文化的血脉得以传承，图民族文化之新于古老传统之中。每一篇章都倾注着先生对承续民族传统之激情与思索。此心此举，功德无量，亦先生数十载倾心儒学研究之一特写耳。

传统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基础，其每一部分，犹如民族躯体之组成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大写的人。特定的传统造就特定的社会，特定的社会就存在于特定传统的外化和更新、流变过程之中。每个人正是来自这传统，存在于此过程。

19世纪以来，饱受侵略之苦的中国人似乎看出，落后挨打的根源在自身的文化问题。于是，民族自强的努力被诉诸文化的变革，而这种变革的失败亦复被归因于自身文化问题。近代以来对传统的这种不断的怀疑、排斥与否定，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残裂，乃至道德价值观念混乱。这一诉诸传

统文化问题的历史经历和致思路向，已成为当今中国人必须慎思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一种认识愈见明晰：任何试图与自己民族的传统相“决裂”的做法，都只能导致中国文化内部张力过度，给社会带来痛苦、迷惘和人格分裂。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说：“一言以蔽之，人根本没有本性；他所有的是……历史。”那么，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个民族群体在不同时空中表达出来的共同人格。这种“表达”的脚本，就是一个规范系统；中国历史上，儒、道都是社会规范系统的不同表现方式。

所谓“六经皆史”，乃指六经为远圣先贤对中国上古传统之检省、凝聚和升华，揭示着中国人的精神历程。进而论之，老庄亦史也。尽管道家与儒家的社会主张在方法上各有不同，但本质上却同属治世之术。基于对民族气质之观察和描述，道家先哲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之精神内构和社会治理所应采取措施的思考。孔、老所论皆圣人之道，本质皆“认识自我”之学问；他们所追求的是中华历史上的理想人。儒家所论乃社会实践层面的圣人之道（人之道，或曰外王之道）；道家所论则是圣人之道的本体依据（天之道，或曰内圣之道），即自然之道，是主体内证的圣人之道。

事实表明，原始道家并不与儒家相绌，而是说出了问题的更深根源。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老子》：“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贞臣？”这与儒道有争以后被删改过的世本《老子》大不相同。

因传本《老子》批评儒家，于是人多以为儒、道原本便各论其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本自然和天道，儒主人道。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论：“世

之学老子者则拙儒学，儒学亦拙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实则非也。应当说，儒道之所“不同”，本质在于“所道不同”。因关注中心有异，老子所指之“可道”和“非常道”，在不同学派中被作了不同的表达，而非“所据（即道）不同”。他们都在表达对“道”的理解及其施行问题。这个道，就是从宇宙到人间的秩序的根据和出发点。一旦儒家探讨人间事务的根本依据，考虑人间秩序安排的可靠基础，他们也必然地回归到对天道的探求。这样一来，人间社会的自然特征，如血缘、亲情、基本利益单元、自然人群聚落乃至利益共同体等等，便成为其学说理论的出发点，所谓天道也就落实为儒家的社会治理之道，正如《周易·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可见，儒家讨论人间事务的准则，实质上同道家一样，都是从人之内在属性出发。儒家基于血缘来论证人伦之道，并要求每个人都从自己去发掘道德的根据，因而也时常主张“求诸己”，也溯道德之源于自然（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之类的推己及人的“恕道”，皆本乎个体、血亲之类最原始之基础（由“己”、由“吾”而推之），归于自然之道。孟子即于人心之自然而发现仁义礼智“四端”之“始然”；他的“不忍人之心”、“怵惕惻隐之心”就是自然之心，实即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自然而

然)。而且这种自然而然，在孟子那里获得了高度一致的表达：“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事实上，若非出于自然之心，亦终为儒家所摒弃。

儒家的形上之“理”和“道”，实质乃自然之理，自然之道，实与道家同。道家要求因乎自然，自然而然。人伦事务要发自内心之本然，勿以有为而坏其本然之美。而被视作道家社会思想标志的“无为”，也曾被孔子深深推许：“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儒家怀疑用道家无为之术是否能有效地管理社会，道家则怀疑过多的人为控制是否能够使一个社会保持长久的秩序与生命力。

要言之，儒、道本同一道，共同地表达着中国人。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出土简帛的研究，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证实了这一点。如有学者指出：“战国中期是一个儒、道、墨、法、阴阳诸家思想交融互渗的衍化期，每种哲学流派都必须尽量吸收其它学派的思想以丰富自己，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不存在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种纯粹的学派，亦不宜以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种纯粹学派去讨论当时人的学派归属问题。”单就儒、道二家而言，思想的相互吸收和交融也是当时一常态现象。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虽主体为儒家作品，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成分，是一篇融合了儒道思想的哲学心性论著作”。再如郭店楚简《老子》，也将一般意义上的儒家诸德仁、义、礼、智、圣视作“五行”，认为“五行出自天道，下降为人德，尽管它与儒家的立场并不一致，但在这一点上，却与其主旨并不相悖”。“也就是说，《老子》之

道本就包括仁义之道，只不过它们在道家的系统中不占首要地位而已。”“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子也具有明显的思想兼容性，他从未对道家提出指责，而是吸收它的思维方式。

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均在哲学意义上回答了“道”之于人的本体意义、如何与道家一样从人自身发现天道等问题。“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中庸》所谓“诚”，及道德的内在自然依据问题，皆与道家自然之道合。儒家所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逻辑，各层次间亦存在自然生长关系，是社会向度的自然之道。

道家循性，儒家理性，两家各执大道之一端，然皆本一道，皆因性成圣之学，而分述中国人性之一面而已。即使是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的战国时代，也有庄子提出“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天地》）的热切诉求。其目的，无疑是力求重现“古人之大体”，即大道不废的状态。

思想家追求学说的圆满，这种追求表达着人对自性完满之寻证。儒道固然存在思想分野，但在与特定政治利益发生关联以前，这种分野毕竟仅仅发生于学说探索路径的层面，因而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两大学派的分与合完全服从于特定思想家及其学说的需要。战国末期，荀子试图以“兼陈万物而中悬衡”之法，在批判的基础上，去蔽通明，简择兼纳百家，以图彻底的“中道”。作为稷下学宫的祭酒，他能够俯瞰简择，汲取诸子尤其是道家某些思想，营建起以“虚一而静”为核心方法的无所不包的自觉兼容结构。如其论“性”、“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即

透露出浓厚的依乎自然的道家认识特征；他对儒家从治身到治国的“治之要”的重组，也利用了道家思维之术：“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荀子·解蔽》）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唐人陆希声亦言：“周之末世，其几矣，于是仲尼阐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据三皇之质以救其乱，其揆一也。”（陆希声《道德真经传序》）此虽未及其详论，然于儒、道两家相通处当皆有所见焉。

后世之所以视儒、道为截然之两途，甚至形同水火，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依当世政治统治之需要而作不同程度篡改的结果。由于政治介入，汉以后儒道两大学派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所用，尤其是唐以后六经取士，遂使两者在世俗社会进入矛盾状态。“世因谓老氏之指，其归不合于仲尼，故皆其名则曰槌提仁义，绝灭礼学；病其道则曰独任清虚，何以为治。于乎！世之迷其来远矣，是使老氏受诬于千载，道德不行于当世，良有以也。”“故其道始于身心，形于家国，以施于天下，如此其备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导斯民以仁义之教；老氏亦拟议伏羲，弥纶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与夫子合其权也。”（陆希声，同前）当学派与利益相缠结的矛盾成为过去，思想之本真应该得到揭示，因此所曾出现的扭曲亦应得到矫正。现在，儒道政治化背景已消散，原始儒道文献纷纷出土，诸事具备，今人应努力还原儒道学说之本体，探其真，质其实，重现圣人真知，合诸子以

图古圣之大体。

儒、道之学乃中华命脉，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学者乃圣学之传承者，当担承历史使命，发掘之、维系之、弘扬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录》中）身未必圣也，心则上善。存是心，为是学，几圣矣！

我们的研究，不仅是对民族传统的回顾与梳理，更是一种检讨，一种智慧和精神的升华，和对未来的预示。“君子有常”，这种检讨和升华使我们在未来生活方式中继续发现自我的连续性获得可能，从而使我们找到我们更高的意义。“生活中已经实践过的经验规范着人的未来。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将会成为什么样，那么我们也会知道他将成为什么样。人乃生活在过去的视域之中。”把握过去，是为着从中开出我们的未来，这也正是《儒学文化新论》处处体现的学术精神。

尝久居西蜀，幸蒙先生提掖与教诲。先生思维清晰缜密，蜀中无出其右，学风朴实谨重，实乃无声之教。先生之学术良心与峻严风骨，令人仰畏，吾辈楷模。忘年之谊，更引为幸，没齿未敢忘怀。身虽在鲁，心未尝不思念之！今先生大作既成，嘱余为序，未敢当也，聊缀数言，得悟所感，以质诸君子同道焉。

乙酉夏至齐鲁山中
2005年7月1日

前 言

这部《儒学文化新论》是继 1995 年 1 月，巴蜀书社为我出版的《儒学文化论》之后的又一部著作，它汇集了我对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能把我 20 多年来研究的儒学论文中最精华的部分奉献给广大读者，让广大读者阅读、批评、指正，十分高兴。

我对儒学的研究，或许有某种缘分。1959 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系上开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这两门课。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邱坤教授，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热情的循循善诱的导师，在他的启发和感召下，使我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使一些人开口希腊、闭口罗马，似乎中华民族没有自己的哲学。邱老师反复地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丰富的哲学，你们应当好好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加上解放以前，我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之类的书，于是我跟邱老师学习中国哲学史。学年论文研究唐甄的哲学思想，由卿希泰老师辅导；毕业论文研究孙中山的认识论，由戴大禄老师辅导。大学毕业后，被选到了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事哲学的研究。

1978 年 10 月，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之后，本想从事

——.....1..

社会学研究。已故著名的科学家、我的挚友赵洪洲教授给我寄来俄文版的《科学社会学》一书，要我翻译成中文，以作为研究社会学的准备。但是，当时的所领导动员我研究中国哲学史，说我们社科院不能没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还说像你这样年纪的人，既懂哲学，又懂古代汉语的人不多，这样“被迫”改变了研究社会学的打算，我的研究方向就这样定下了。从此以后，主要从事儒学、易学和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研究过四川的思想家，如赵蕤、唐甄、杨慎、来知德、刘沅、廖平、蒙文通等。主持对廖平的研究，与蔡方鹿同志等人合著《廖平学术思想研究》；主持编写《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中国哲学志》；点校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注释明代著名僧人智旭的《四书禅解》和《周易禅解》，与西南民族学院的杨树帆副教授合著《周易入门》等。

1995年后，我的研究重点不是在阐述儒家学说有什么内容，而是重点揭示和发掘儒家学说有什么现实价值，它对我们当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何意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系统研究了儒家的管理思想，先后主持编写了《中华儒学文化系列》丛书和《中华儒学文化与现代管理艺术》丛书，著有《盛德大业——儒学与企业管理》、《道之以德——儒学德治与现代管理的道德性》两部著作，撰写了一系列儒学与管理方面的文章，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中国管理传播网”和“博锐管理在线”主动为我建立了专栏。

儒学以它悠久的历史，以它内容的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国家统一的维护、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无法估量的作用。它

向邻国传播，和当地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儒学特色的民族文化，即所谓“儒家文化圈”。当今世界上，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欣欣向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说明儒学文化与现代化是完全相融的。现在世界上不少有识之士，高度评价儒学的现代意义，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在其所著的《儒学的复兴》中指出：“儒学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世界文化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将带领世界进入 21 世纪，即将成为 21 世纪管理的主流。”作为儒学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更应该珍惜这份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儒学是给人以智慧的学问，它教导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教导人“学而时习之”，教导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它教人如何“知人识人”，教人如何“用人”；它教人“执两用中”的方法，教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导人提高自己的智慧。

儒学是治理国家的学问，它用“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用“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理论，用宽猛相济的治国方法，通过“富之教之”来达到“富民安人”的目的，引导社会走向和谐与协调。建立和谐的“大同社会”是儒家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

儒学是升华人性的学问，它用“仁爱”思想去教育人，改造人性的邪恶，导人为善，导人“仁民爱物”。

儒学是导入立德立功的学问，它强调修身养性，廉洁奉公，倡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满，导人追求最高的道德境界

和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理想，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儒学是追求人际和谐的学问，它提倡“忠恕”之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教导人们要互相理解，相互宽容，时时事事以“和为贵”。

儒学是培养人才的学问，它实行“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以“文、行、忠、信”为内容，通过“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等方法，全面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类人才。

儒学是管理的学问，它通过以人为本，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对组织实施管理，把组织引向有序化，以图实现组织的管理目标。

儒学是保护自然生态的学问，它以天人合一的理论，强调“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把人的仁爱之心扩展开去爱物、爱自然、爱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教导人们“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要求人类保持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儒学是倡导世界和平的学问，它主张世界上各民族互相学习，和平共处，先进的民族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落后的民族，反对民族之间进行战争，把世界导向一个和平的世界。

当今推崇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以及“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行方式，均渊源于儒学文化。只有真正建立在“以

民为本”基础之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而不是垄断资本家分享政权的、没有人民权利的民主；只有真正做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才能建设起文明的民主的和法制的社会。只有政治上的民主、公平、公正和廉洁，经济上的均富、公平，消除两极分化，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法制观念的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这就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去挖掘儒家文化宝库中的宝藏，去加以提炼、改造、更新、熔铸和创新，为建设一个我们理想的“和谐社会”服务。

我的家在重庆南川与金佛山遥遥相望的浅丘山中，那里起伏不平的山丘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青松，像是大海平静的波纹。记得有一句歌词：“我们像太阳像青松，永远光闪闪，永远绿油油。”青松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掉在地上的松针像金色的地毯，小的时候躺在上面仰望着从树缝中透露下的阳光，那一道道阳光像无数绷直了的丝带，柔和而有力，呼吸着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十分惬意。我爱青松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怕严寒的品格。每天只要一开门，巍峨的金佛山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夏日山体葱茏，山的上端像刀截一样的石英石，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冬日山顶冠着白雪，十分壮丽。金佛山的神秘，使我时时沉浸在无限遐想中；金佛山的巍峨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具有高山和松树的性格，加上出生于贫穷而淳朴的农民家庭，性格直率，不会奉承迎合，因而头顶上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我只知道辛勤的耕耘，等待秋天的自然收获。我一生与世无争，不强行去追求某个目标，一切听从自然的安排，一生只认真做了两

件事：一是做了我能够做的事情，二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问心无愧的。这部《儒学文化新论》一书的出版，应该是我等候的秋天的收获之一吧。现在，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我还将要继续收获，发挥已有的余热。我曾写过一首《致友人》的诗，这首诗也反映了我的经历，抒发了我现在的心境，诗云：初识在京华/已过四十秋//曾遭霜雪折磨/患难兄弟同忧//春风扭转乾坤/浣花溪畔/再度风雨同舟//人生旅途各异/均已到白头//是非成败任评说/让晚霞久留神州。

现在正是阳春三月，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只要不断地辛勤耕耘，希望就定能变成现实，等到收获的季节到来之时，一定会获得新的丰硕的成果。

陈德述

2005年4月

于成都南河畔青松斋



陈德述 男，1937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川县（今属重庆市）。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被选到原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9年1月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中国哲学、儒家管理以及易学的研究。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易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成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省中华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通讯》副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中心常务理事等，主持并撰写《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中国哲学志》；主编《中华儒学文化系列》（共九种）、《中华儒学文化与现代管理艺术丛书》（共七种）、《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华孝道文化》。主要著作有：《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合著）、《儒学文化论》、

《盛德大业——儒学与企业管
理》、《道之以德——儒学
德治与现代管理的道德
性》、《周易入门》（合
著）、点校唐代李鼎祚
的《周易集解》、注释
明代著名僧人智旭的《周
易禅解》和《四书禅解》、
发表论文140多篇。

